

忆何炳棣先生

葛剑雄

我随季龙先师去北京参加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工作会议，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。那天下午散会早，我们回房间早，忽然何先生出现在门前。原来他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访，正在北京，我们这次会议是由社科院召集的，他得知谭先生在就找来了。他们一见如故，谈得很投缘。或许因为是初次见面，或许因为他对先师特别尊重，这次何先生没有月旦人物，也没有骂人。何先生走后，先师说他是南人北相，不仅相貌，各方面都像北方人。

2011年11月我去南加州大学参加会议，那天外出参观，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朋友谈及何炳棣先生，得知他的近况。自师母邵景洛去世后，何先生的日常生活失去了悉心照料。何先生与已退休的儿子同住，但他个性极强，非但不会开口要人照顾，连学生、晚辈主动送去的食品用品也不一定接受。本想去看看何先生，得知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这样的生活状况，就打消了这一念头。

2012年6月传来何先生去世的消息，虽然我还不知道他离世的详情，但相信他一定是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和时刻告别人生的。

我最早知道何炳棣这个名字是在“文革”期间。那时，中学教师作为国家干部是可以看《参考消息》的，其中多数内容是外国媒体的报道。频频出现的名字有女作家韩素音，以后增加了记者赵浩生和教授何炳棣。国内的报纸也报道过他回国受到领导人接见的消息。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，一位多次来复旦的台湾旅外地理学者又谈及何炳棣。这位先生的大话谎话说过不少，所以我只当笑话听，也还不知道何炳棣是何人。

在我写硕士论文期间，从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上看到一篇王业键教授讲学的报道，介绍何炳棣所著《1368—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》一书的主要观点，感到很有说服力。但遍查上海的图书馆也未找到。先师季龙（谭其骧）先生为我致函中科院图书馆的熟人，请他在北京寻访，也一无所获。1985年7月我一到哈佛大学，就迫不及待地去哈佛燕京图书馆读这本书。

尽管当时还来不及领会书中的内容和观点，但对长期封闭造成国内学术界的闭塞却已不胜感慨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一些学者重新“发现”了



何炳棣晚年回国进行交流

清初户口统计数中用的是“丁”，而不是“口”，因而当时的实际人口应该是“丁”数的好几倍。但不久就有人指出，早在三四十年前萧一山、孙毓棠等就已经有过正确的结论。接着，争论转入“丁”与“口”的比例问题，并且一直没有取得结果。可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步入歧途，因为清初以至明代大多数时期的“丁”与“口”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比例关系；而何炳棣这本出版于1959年的书已经作了很严密的论证。所以这场看似十分热烈的讨论，其实不过是重复二三十年前的认识过程的无效劳动。与此适成对比的是，当我在美国一些大学中间那些中国史研究生时，他们几乎都知道“丁”的真正涵义是“fiscal unit”（赋税单位），而不是“population number”（人口数量）。

去美国前，我就打算去芝加哥大学向何先生当面求教，请先师预写了一封介绍信。先师与何先生并不相识，但有一些间接的关系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有三位著名的美籍华人的子女要求来中国留学，其中一位

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子李中清（James Lee）。由于这是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的，得到他的特别批准，李中清被安排在复旦大学。在此期间，先师奉命单独为李中清讲授中国历史。李中清很重视师生情谊，回美国后与先师仍有书信来往（当时都得交党委审阅），后成为何炳棣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。国内召开纪念何炳松的学术会议时，曾请先师撰文并报告，而何炳松是何炳棣的族兄。

那时我初出国门，不习惯打电话联系，只能先将先师的信寄给何先生，表示拜谒求教的愿望。哈佛燕京的津贴虽还充裕，但对于只借了200美元出国、又要维持一家三口生活的我来说，要专程从波士顿去芝加哥一次也不能随心所欲。次年春，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在芝加哥举行，我才借此机会在会后去见何先生。得知我有此计划，孔飞力（Philip Kuhn）教授介绍我住在他的学生、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艾恺（Guy Alitto）家中。不过他警告我：“这老头脾气很大，你得小心被他骂。”

初次见面是在何先生的办公室。按照电话中的预约，我尽早到达，但在走廊里等候许久还不见动静。我试着叩办公室的门，原来何先生早已在内。他说楼前的停车场太大，如果来晚了，车会停得很远，所以他每次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。好不容易有了这次当面求教的机会，在何先生了解我的学历后，就提出了人口史研究中感到困惑的问题。何先生并未直接回答，却着重谈了如何理解制度的实质，“其他方面，你仔细看我的书就能明白”。“我研究的是明清以降，但制度的原理是相通的，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，就是西洋史与中国史也是相通的。”他告诉我，当年来美国留学，学历史的同学几乎都以中国史为博士论文题目，“连我那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长，写的也是《晋书·食货志》，只有我何某人选了西洋史，而且博士论文是研究英国土地制度史”。他力劝我先学西洋史，在此基础上才能在研究中国史中取得成绩。他表示，如果我有此打算，无论是留在美国或是去欧洲，他都可以提具体建议或给予帮助。虽有些意外，我还是谢绝了何先生的好意，我说已经41岁了，历史地理还刚入门，外语基础也不够，“如果我年轻10岁，一定按你的指导先学西洋史”。不过何先生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也产生了持久影响，此后我虽没有专门学西洋史，但在研究每个问题时，都会注意它与国际上的关系。在未了解世界上相关情况前，绝不轻易作国际比较，在谈中国问题时不轻易涉及其世界性。在写《统一与分裂：中国历史的启示》时，我专门查了几种世界古代史，将各国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与中国作了比较。在研究中国人口史时，也与法国、英国、美国、日本的人口史学家作过交流，查阅了相关论著。

第二天下午，何先生又约我去办公室，对我提出的一些

问题作了详细解答，他也问了我先师编绘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情况，以及《图集》一些体例。提到秦汉史研究时，我说杨联陞先生曾要我看看许倬云的书，何先生说：“他的书不值得看，他的学问和眼光都不行。”又说：“书不是看得越多越好，原始史料的书一本不能缺，后人写的书要选择。”结束后，何先生留我晚餐，由他开车去中国城餐馆。途中我想起包里还有一本带来送给他的书，边说边从包里取书。何先生误以为要送他礼物，立时不悦：“国内来的人就是喜欢搞这一套，我最不喜欢人家送礼。”不等我解释，他勃然大怒，将车驶至路边停下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今天的饭不吃了，带上你的礼物回去吧！”我赶快将书取出，放到何先生面前，他才转怒为喜，“很好，这本书我要的”。在他经常光顾的中餐馆，何先生点了一道溜鱼片，劝我多吃。“这里的鱼很新鲜，没有刺，但其他餐馆没有这家做得好。”

期间他带我参观芝加哥大学的东亚图书馆，接待的是马泰来。何先生特别让我看了方志部，他说：“这些年芝大收的方志很多，虽然有些只能靠复印，但在北美大概是最全的，比国内一般机构都收得多。我写书时，将在北美能找到的方志都翻遍了。”出来时正遇到钱存训先生，马泰来作了引见。但何先生仅打了个招呼，转过身来就对我说：“此人就靠资历，却很霸道。”

临行前一天的晚上，他约我到他府上去。知道我住在艾恺家，他一定要开车来接我。他的寓所是一幢两层小楼，地下室很大，是他的书房。大厅里挂着齐白石、黄宾虹等名家的画，我们在画前留影。何师母得知我来自上海，说：“上海好，他一直说想去上海。”我得知何先生当年有访问中国的计划，就建议他将上海包括在